

# 建構記憶之地—— 中正紀念堂領袖紀念館中的國族地方感

葉韻翠<sup>1</sup>

## 摘要

近年在轉型正義等議題下，多數人所注視的中正紀念堂，多著重外部的文字地景與文化地景；作為一個國家級的領袖紀念館，其內部自 1980 年開堂以來陳設的領袖文物展視室，亦為博物館學所忽略。是故本文欲採用田野實察法輔以文獻分析，以中正紀念堂的蔣中正總統文物展視室為核心，探討臺灣的國族地方感是如何在領袖紀念博物館中被建構與呈現，並析論其意涵。

文物展視室自設立以來，展示目的曾隨著時代變化而調整變遷。由 1980 年代的「永懷領袖」——推崇蔣中正的勳業以建構領袖崇拜及紀念，至 1990 及 2000 年代展示蔣中正一生功績及中國近代史，以領袖象徵國家的意味相當明顯。進入 2010 年代以後，領袖紀念館的展示有了重大的調整，以臺灣為展間主題乃首次浮現。歷經臺灣民主化歷程的中正紀念堂，目前展間大致順著蔣中正的人生歷程，主題由「家庭」到「革命」、「抗戰」、「內戰」、「臺灣」最後到總統紀念辦公室，結合中國記憶與臺灣記憶，也象徵著中華民國來自中國大陸，最後歸向臺灣的國族地方感轉向過程。當中在國族地方感的營造方面，除了利用歷史事件直接訴諸對於國家空間的記憶與認同之外，更時常透過與國際間的往來，定位中華民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形象，與蔣中正作為大國領袖的地位。

關鍵詞：中正紀念堂、國族地方感、領袖、紀念、博物館地理學

## 前言

### 一、領袖紀念館與權力紀念

落成於 1980 年的中正紀念堂，是戒

嚴時期臺灣興建的第二座領袖紀念館，時間晚於國父紀念館，但園區建築格局與規制卻遠高之。中正紀念堂的傳統參訪路線，係以正面牌樓「大中至正門」（今上

<sup>1</sup> E-mail: tea2011@gms.ndhu.edu.tw

書自由廣場)為起點遠眺瞻仰紀念堂,沿園區中軸線向東朝紀念堂步行前進,途經兩廳院間的「中正廣場」(今民主廣場)與 215 公尺長的「瞻仰大道」(今民主大道),行進間感受園區的宏敞與肅穆。至紀念堂前拾級而上象徵蔣中正壽齡的 89 階階梯後抵達「銅像大廳」,迨向蔣中正銅像致上崇敬與懷念之意後,再乘電梯下到紀念堂下層參訪「永懷領袖文物展視室」(今名蔣中正總統文物展視室)。透過 6 間展間歷史文物的展示與解說,「以表達 蔣公救國救民之豐功偉績,與偉大人格之形成,從而增進國內外人士之景仰與追思。」(薄蘭軍,1989: 59)

興建領袖紀念館是許多現代國家用以推崇、緬懷特定國家領袖的紀念方式。透過紀念地景結合博物館的型態,向人民呈現、展示、述說領袖的個人特質及其對國家的「偉大貢獻」,藉以指向當下政治權力所欲標榜的國家道路與意識型態。領袖紀念館既是紀念權力,更是鞏固政權自身權力的一種方式。例如臺灣臺北的國父紀念館與中正紀念堂、美國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越南河內的胡志明紀念堂、中國北京的毛主席紀念堂等。

Dickinson、Ott 和 Aoki 為我們指出博物館具有作為經驗地景的功能,提出 3 個相互連結的原則,讓我們能更進一步理解博物館:(一)博物館或紀念館應被視為是傳播的文本(diffuse texts),而非被抽離的文本(discrete texts),亦即我們應當以整體的區位環境思考博物館的意義,而非僅將其視為是一個孤立的建築單元。(二)博物館除了是較大的物質、歷史、文化場所的一部分外,也是認知地景的一部分,作為一種「夢境」提供人們對於歷史、記憶影像體驗的經驗地景。(三)經驗地景會使訪客採用一種特殊的主觀位置,從而塑造識覺(Dickinson et al., 2006: 29-30)。此外,K. E. Till 以人文地理學中的「地方」概念

看待博物館的社會功能,認為國家博物館是一種特殊的記憶之地,由創造社會記憶之地(place of social memory)來真實化、合法化關於過往的選擇性故事,進而創造出現時的集體認同;「博物館、紀念館與紀念碑傳統上作為國家官方的記憶劇場,因為他們提供公民儀式、故事進行表演、上演、理解與競爭的一種空間脈絡。」(Till, 2001: 273)借用 Dickinson、Ott 和 Aoki 所提出的第二、三點概念以及 Till 的想法來思考領袖紀念館的設立,更可知道其作為一種「經驗地景」讓訪客不自覺地在參訪過程中採用了官方所設定的價值、認知與識覺,進而承認、紀念、緬懷領袖及其所象徵的權力,以塑造「歷史化」、「特殊化」的集體/官方/國家記憶。中正紀念堂也在這樣的目的之下於 1980 年代躍然登場,登上臺灣地景與文化政治的競爭舞臺。

## 二、生前死後的中正崇拜與中正紀念

蔣中正在世時,部分地方政府及親蔣人士即透過不同的方式,為其推動個人領袖崇拜,協助鞏固政治權力及領導地位。在其逝世之後,這樣的領袖崇拜轉而化為領袖紀念,並為國民黨政權所沿用,繼續扮演著鞏固國民黨執政地位的角色。

生前死後的中正崇拜與中正紀念在近十幾年來一直是研究者們感興趣的焦點,自臺灣邁入民主化時代以迄訴求轉型正義的今日,蔣中正的領袖紀念議題熱度仍未見退卻,反而益發蓬勃。諸多研究者試圖由不同的文化媒介,探尋中正崇拜與紀念在政治作用之下如何被人為建構出來,以為特定政治權力服務,解構黨國體制下的領袖崇拜迷思。例如周俊宇(2007)與黃倩茹(2011)的研究係以中正崇拜為核心,分別以祝壽活動、事略稿本作為取材析論對象。另外,周俊宇在 2012 年的文章再以中正紀念為中心,選取清明節(1912-2008)

為主題，探究民俗與政治之間的關聯。而李筱峰(2009)與葉韻翠(2014)的研究橫跨蔣中生的生前與死後的紀念議題，各自選取愛國歌曲與文字地景作為解構的媒介。與前述研究類型較為不同，胡俊佳(2012)與黃志堅(2015)則關注於去威權、轉型正義所影響下的紀念相關議題，分別藉由兩蔣文化園區與中正紀念堂的更名事件進行討論。

這些以紀念為主題的中正研究包含了節日(祝壽活動、逝世紀念日)、書籍(事略稿本)、歌曲(愛國歌曲)、文字地景(領袖地名)、文化地景(兩蔣文化園區、中正紀念堂)等不同的文化介質，在在指出生前死後的中正崇拜與中正紀念，在諸多方面深度且普遍地滲入了常民的生活，並以稀鬆平常的方式不知不覺地影響人民的識覺。而在去威權與轉型正義的訴求之下，與其紀念有關的文字地景與文化地景則因外表的顯著性而備受關注，進而成為不同主張與意識型態間的競爭對象。

### 三、研究目的與方法

中正紀念堂除了是一種文化地景之外，由於堂內領袖文物展視室的設立，使其亦帶有博物館性質。戰後臺灣國內博物館的經營與目的受到政治力的大力主導、介入，博物館成為國家文化治理政策下的一環，隨著政治社會氛圍的轉變而進行調整。因此多位研究者乃透過政策的角色，聚焦在政治力如何影響博物館的經營，國家層級的歷史類型博物館是諸多研究者相當感興趣的對象。例如林正儀(2004)、洪玉茹(2004)、蔣雅君、葉錡欣(2015)分別以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故宮等國家級博物館為中心，探究政治再現下的博物館發展與轉變。

研究的熱度部分反映出臺灣政治、媒體、人民對於相關議題的關注程度。然而大多數人在近來去蔣、去威權或轉型正義

議題下所注視的中正紀念堂，多著重其外部的文字地景與文化地景議題。而作為一個國家級的領袖紀念館，其內部自開堂以來陳設的領袖文物展視室亦為博物館學所忽略，目前尚未見到以蔣中正總統文物展視室為題材，抑或是其他領袖紀念館的博物館研究。因此成了本研究的一項動機。

在眾多的博物館類型中，領袖紀念館可說是政治色彩最為鮮明的一種。領袖象徵了國家。以國家領袖為名的各式紀念，「直接與政治產生關聯，並表現出對特定領袖的尊崇與紀念，宣揚、塑造官方所欲傳達的意識型態與價值觀，並藉以形塑政治氛圍，或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葉韻翠，2013: 58-59)領袖紀念館不但是政治霸權涉入文化與社會教育的一項手段，更往往是國家力量向國內、外宣揚國家認同的展示場域。領袖的生平與事蹟時常與國家的重大歷史相交織，領袖紀念館因而成為公共記憶的儲存器，歷史事件座落的空間場域更成為國族論述挪用以建構出一種國族地方感的利器。筆者在2017年初次參訪中正紀念堂的文物展視室時，發現其展品解說時常運用連結特定時間與空間的手法，編寫出特殊的領袖紀念與國族敘事。因此在這篇研究中，筆者擬以中正紀念堂這座領袖紀念館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前述中正紀念研究及博物館學仍未碰觸的議題，即如何透過領袖紀念來塑造國族地方感，以期拓展中正紀念研究與博物館學的領域，提供臺灣對於領袖紀念議題另一種不同的解讀方式。

蔣中正生於清光緒13年(1887)10月31日的中國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1975年4月5日逝世於臺灣臺北，於1938年至1975年擔任中國國民黨總裁，並於1950年3月1日至1975年4月5日任職中華民國行憲後的第一至五任總統，為行憲後歷任總統中，任期最長、威權色彩最為濃厚，亦是紀念政治中最具爭議的一

位總統。然而在後威權時期其領袖紀念館卻仍被保留下來，甚至在 2007 年 11 月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公告指定為國定古蹟，翌年 3 月再被臺北市政府登錄為文化景觀（簡惠文等編，2014: 10）。P. Gruffudd 曾表示國族主義意識型態時常是「地理的」，因為它基於一種領土的主張並表明一種清楚的地方感（Gruffudd, 1999: 202）。蔣中正的生平涵括了中國與臺灣兩地的國家記憶。而其主政時期更是黨國不分的年代，黨的地位往往凌駕於政府制度之上。在其威權統治之下，領袖的權力甚高於黨的權力，因此以領袖象徵國家，以領袖紀念館訴說國家故事都有高度的代表性。令人特別感興趣的是，領袖紀念館中的展示文本，主要想要訴說哪段時空的歷史記憶？建構出什麼樣的國族地方感以向臺灣人民傳達、塑造國家圖像？生命歷程跨越兩地的蔣中正，其紀念文本中如何呈現以及呈現出什麼樣的國族地方感？

為此，本文欲以中正紀念堂一樓設置的蔣中正總統文物展視室為核心，以國族地方感為議題，探討臺灣的國族地方感是如何在領袖紀念博物館中被建構與呈現，並析論當中所代表的意涵。筆者於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8 月間曾多次赴中正紀念堂進行田野實察，期間蔣中正總統文物展視室的展示主題未經更換，但展品可能經過局部的調整更展，內文中對於展品的分析係以 2019 年 4 月 13 日所採集的分析情形為依據。以下內容將析分為五部分進行討論，首先對於中正紀念堂領袖紀念博物館的展示經營脈絡進行釐清，其次依據

展間的主題，區分為一至四展間的中國記憶與五至六展間的臺灣記憶兩部分分別探討之，爾後試圖以展品所呈現出的國際外交從另一個角度定位臺灣的國族地方感，從而於文末提出結論。

## 蔣中正總統文物展視室的展示變遷

對蔣中正的眾多領袖崇拜手法中，有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即是透過地景與空間的命名來推動。在二戰後的政治轉換下，以「中正」為名的中正崇拜風潮由中國大陸襲向了臺灣，並大量在各式公共地景與空間中出現（可參見葉韻翠，2014）。這股生前死後對於蔣中正的領袖崇拜與紀念熱潮，可說是以中正紀念堂的興建達到最高峰。

座落於臺北市中正區的中正紀念堂<sup>2</sup>，是各式中正紀念物中規模最大、耗費最多——面積廣達 25 公頃、建築經費高達 12 億餘元<sup>3</sup>——並企圖以最能達到恆久保存的方式進行建造，以示對於蔣中正「千秋萬歲」、「萬古常新」的「永恆懷念」。

在蔣中正逝世之後不久，內政部即擬訂永久紀念總統蔣公辦法七點，並在 5 月 14 日、5 月 15 日先後經國民黨中常會、行政院院會通過，再由行政院依行政程序分行各機關辦理。這個黨、國一致決議的紀念辦法第二點內容，即「由政府統籌於臺北市興建一座『中正紀念堂』，所需經費除政府撥款外，可接受各界自由樂捐，其他各地不必分別另建。」（經濟日報，

<sup>2</sup> 命名為中正紀念堂的紀念建築並不只一座。早在 1936 年的中國，親蔣的地方政府江蘇省民教館即在徐州開始興建具有戲院功能的中正紀念堂，翌年落成時更邀請了蔣中正直系子弟兵、時任第一軍長的胡宗南進行揭幕儀式（中央日報，1936.10.17: 第 1 張第 4 版；中央日報，1937.5.2: 第 1 張第 4 版）；而 1953 年的金門亦存在著中正紀念堂（聯合報，1953.1.1: 第 2 版）；1985 年 10 月 31 日東海大學啟用新建禮堂性質的中正紀念堂（中央日報，1985.10.22: 第 4 版）。

<sup>3</sup> 當中有 2 億餘元為全民獻建，其餘則由國庫支出及利息收入。〈1975-1991 時代縮影 做歷史的見證 內容摘要〉，堂史室，<http://hallhistorycenter.cksmh.gov.tw/history/1975/intro.html>（瀏覽日期：2019/08/06）。

1975.5.15: 第 1 版；經濟日報，1975.5.16: 第 2 版) 為此，1975 年 6 月蔣經國主持的行政院，決議興建中正紀念堂，並核定設立了以俞國華為召集人的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負責一切建堂的相關事宜（俞國華，1980: 20）。紀念堂園區工程分為兩期先後進行<sup>4</sup>，紀念堂主體及中正公園、牌樓、迴廊、角亭、瞻仰大道等紀念相關的周邊建築屬於第一期工程，工程擇定於 1976 年 10 月 31 日蔣中正 90 歲冥誕進行破土奠基，正式工程於 1978 年 1 月 15 日開始挖土施工，於 1979 年 10 月 20 日及 1980 年 3 月 20 日分別完成結構與裝修工程，同年 4 月 5 日對外開放（陳長華，1976: 82；周守信，1980: 22、24；林椰官，1980: 3）。

### 一、開展之初永懷領袖文物展視室的籌劃

1975 年 7 月 1 日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奉令成立，由籌建小組成員之一、具學術背景的秦孝儀負責籌辦展視室<sup>5</sup>。23 日籌建小組召開籌建會議時，除了對中正紀念堂興建的設計原則、地點、內部構造原則作了初步決定之外，並擬於紀念堂中開設「總統蔣公勳業館」，陳列其一生對國家民族貢獻的勳業史料（中央日報，1975.7.24: 第 3 版；中央日報，1975.8.22: 第 3 版）。領袖紀念館為了配合與紀念堂同時開放展覽，1979 年 3 月 23 日中正紀念堂陳列室專案小組曾邀集蔣復璁、何浩

天、周應龍、林克承、劉安濤、李雲漢等歷史、博物館相關背景的學者舉辦「中正紀念堂展覽設計顧問座談會」<sup>6</sup>。

隨著第一期工程完工逼近預計的落成開堂時間，展視室的籌劃更顯得倉促而刻不容緩。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自 1980 年 3 月 1 日起籌備成立以來，在組織架構中「展視」即為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部門。開堂之初文物展視室逕由國民黨中央黨史會派遣總幹事胡璞玉負責策劃，並由政戰學校派藝術系畢業生協助趕工布置<sup>7</sup>（駱鵬，1990: 29）。中正紀念堂的第一期工程於 1980 年 4 月 4 日上午 10 點舉行落成典禮，堂內的「永懷 領袖」文物展視室也同時開放參觀（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編，1985: 80）。同年 5 月 14 日「籌建小組指示成立『永懷 領袖文物宣揚小組』，由黨史會遴選員編成」<sup>8</sup>。

自文物展視室的籌辦到開展都有國民黨及黨史會的高度介入，可以推測初期展覽內容應當高度地反映出黨的想法。與其說這座領袖紀念館是用來紀念蔣中正的一生事蹟，不如說是呈現了國民黨希望建構出的中正意象<sup>9</sup>。

### 二、初期展示主題的設定與展品的更換變遷

中正紀念堂上層為銅像大廳，下層以南北向的中央通廊將空間切分為東、西兩側，「永懷領袖文物展視室」位於東側，

<sup>4</sup> 第二期工程為國家劇院、音樂廳及地下停車場（俞國華，1980: 20）。

<sup>5</sup> 〈1975-1991 時代縮影 做歷史的見證 內容摘要〉，堂史室，<http://hallhistorycenter.cksmh.gov.tw/history/1975/intro.html>（瀏覽日期：2019/08/06）。

<sup>6</sup> 〈1975-1991 時代縮影 做歷史的見證 堂史記事〉，堂史室，<http://hallhistorycenter.cksmh.gov.tw/history/1975/history.html>（瀏覽日期：2019/08/06）。

<sup>7</sup> 〈1975-1991 時代縮影 做歷史的見證 內容摘要〉，堂史室，<http://hallhistorycenter.cksmh.gov.tw/history/1975/intro.html>（瀏覽日期：2019/08/06）。

<sup>8</sup> 〈1975-1991 時代縮影 做歷史的見證 堂史記事〉，堂史室，<http://hallhistorycenter.cksmh.gov.tw/history/1975/history.html>（瀏覽日期：2019/08/06）。

<sup>9</sup> 這裡所謂的中正意象，係指透過紀念館的空間、地景、展品，甚至是氛圍的營造與展示，建構在參訪者腦海中的蔣中正形象。

分為 6 個展間陳列蔣中正總統的生平事蹟圖像及紀念文物<sup>10</sup>。文物展視室屬常設展性質，開展之初主要設定目的為「基於永懷領袖之赤誠」、「弘揚蔣公勳業德澤」、「用以讓世人瞭解，蔣公是曠世偉人，其聖德偉業，光耀寰宇，被於全世界」，並依據諸如誕辰、逝世紀念、抗日勝利等特定紀念節日與擬定的工作計畫，進行定期與不定期的換展（薄蘭軍，1989: 59；薄蘭軍，1990: 68）。

根據《中央日報》在紀念堂落成典禮當天，亦即蔣中正逝世 5 週年紀念活動的報導，當時在展視室展出永懷領袖文物展，內容包含「蔣公衣冠、手稿、勳章、照片、鞋襪，歷史文物及親加批註的書籍等組合，從蔣公的出生、求學、獻身軍旅、國民革命、北伐、抗戰、剿匪……等一生事蹟，作了一連貫有系統的介紹。」（中央日報，1980.4.4: 第 9 版）報導中所謂的一連貫有系列的介紹，實則區分為 11 個主題，亦即：1. 世德鄉望、2. 力學革命、3. 革命的黃埔、4. 鷓鴣未靖此東征、5. 北定中原、6. 第一面反共的大纛、7. 抵禦外侮復興民族、8. 行憲與戡亂、9. 中興再造、10. 銜哀奮勵、11. 對世界永恆之貢獻（近代中國編輯委員會，1980: 3）。另外，根據張歌在 1986 年參訪中正紀念堂後所回憶的內容，文物展視室的展示主題並沒有變動，僅文字上作了些許調整（張歌，1987: 18-20）。而薄蘭軍在 1989 年所指出的單元名稱亦顯示展示主題未經變更，同樣僅微調文字修辭，此時主題名稱為：1. 蔣公的家世、2. 求學與革命、3. 革命的黃埔、4. 東征平亂、5. 北伐與統一、6. 第一面反共大旗、7. 抵禦外侮復興民族、8. 行憲與戡亂、9. 重振革命大業、10. 追思與懷念、11. 對世界永恆貢

獻（薄蘭軍，1989: 59）。這些展示主題在 1991 年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出版《歷史的光輝》一書時，仍未見更動（石曰富總編輯，1991: 32）。

由這 11 個主題我們可以知道，開展之初領袖文物展視室的展示架構大致以蔣中正在大陸的各項人生／國家重要發展階段為核心，展示內容多用來記述 1949 年以前蔣中正在中國大陸的生活與革命、抗戰，僅第 9 與第 10 單元涉及在臺的時空背景。第 9 單元內容為「大陸淪陷，蔣公在臺復行視事，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再造中興」、第 10 單元則主要記錄其逝世後的紀念與追思活動（張歌，1987: 20）。這也代表著，中正紀念堂對於蔣中正紀念所進行的策展中，傳遞出來的是以中國大陸為緬懷對象的國族地方感，展品內容中所出現的臺灣記憶附屬在中國國族主義的框架之下。

根據中正紀念堂開堂 10 年紀念書籍《萬古常新》，10 年來文物展視室更換展品的數量每年少至 72 件，多則達 261 件，合計有 1,315 件（薄蘭軍，1990: 70）。展視室除了一般換展之外，亦曾經挪出空間舉辦過特展，例如 1988 年舉辦悼念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特展、北伐統一六十週年特展等（薄蘭軍，1989: 61）。文物展視室雖然進行定期換展，有時也舉辦特展活動擴大換展，但仍有些較經典的展品自展出後未曾更動過。例如進入文物展視室首先看到的「兩大偉人的契合」巨幅油畫，畫面取自 1923 年 7 月 6 日孫中山與蔣中正在廣州車站合影的歷史畫面（中央日報，1981.10.12: 第 8 版），由開展陳展至今。另外為紀念蔣中正百年誕辰所舉辦的慶祝活動，1987 年 10 月 29 日展出其日本友人增田寮珍藏 60 年的兩幅蔣中正書法「橫

<sup>10</sup> 〈1975-1991 時代縮影 做歷史的見證 內容摘要〉，堂史室，<http://hallhistorycenter.cksmh.gov.tw/history/1975/intro.html>（瀏覽日期：2019/08/06）。

掃千軍」及「平等」，1988年10月31日新增展示兩輛自總統府移交的蔣中正生前座車<sup>11</sup>（薄蘭軍，1990: 69），亦持續展出至今。惟座車最初展示在紀念堂北側門入口處兩側，後移展至展視室內部。

### 三、臺灣命題的出現與現展主題的確立

中正紀念堂落成的1980年代，距離蔣中正逝世的時間尚不久遠，政治氛圍仍處於蔣經國主政下的戒嚴時期威權體制，因此臺灣社會歷年皆以盛大的紀念活動哀悼其逝世。此時期中正紀念堂主要作為領袖紀念功能的色彩相當濃厚，在諸如《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等歷史報刊中對中正紀念堂的報導，亦多以國內外各界人士赴紀念堂參訪致意的相關新聞為題材。而進入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以後，由於戒嚴與動員戡亂狀態的依序解除，不同的政治思想與民主化思潮蓬勃發展，報紙媒體對於中正紀念堂的報導題材也逐漸轉變，領袖紀念色彩已大幅淡化，變遷中的社會與政治氛圍也反映在文物展視室的轉變上。

90年代有立委以總統府空間日漸不足為由，不同意總統府內繼續保留過世元首的辦公室，成為蔣中正總統辦公室空間移設至中正紀念堂的源起（中國時報，1994.10.19a: 第7版）。緣此，中正紀念堂利用空間新闢「先總統蔣公紀念室」，並配合蔣中正108歲的誕辰紀念，於1994年10月31日舉行揭幕典禮。紀念室複製移植了原先總統府內蔣中正辦公室（今總統府臺灣綠廳）的樣貌，正中間有蔣中正於辦公桌的坐姿蠟像（中央日報，1994.10.31: 第2版）。此一紀念室後來更名為蔣中正總統紀念辦公室（今典藏室），於2003年移至文物展視室的第六展

廳。

根據《中國時報》1997年3月17日對中正區「歷史復活節」活動的報導，文物展視室「陳列蔣公紀念文物，內容並依蔣公家世、求學、北伐、戡亂、革命等事蹟依序陳列。」（中國時報，1997.3.17: 第13版）另外，同年6月15日對於兒童導覽「繞著歷史玩」的報導新聞中，則描述「中正紀念堂館內陳列先總統蔣公的文物，介紹其生平事蹟及我國現代史」（中國時報，1997.6.15: 第15版）。兩則新聞雖仍尊稱蔣中正為蔣公，但對於展視室文物展示的內容或目的，則不再使用過分誇飾的推崇口吻。而在2010年度的《中正紀念堂展覽年鑑》描述，「紀念堂一樓大廳主要設有文物展視室及蔣中正總統紀念辦公室。其中常設之文物展視室占地約七百坪，共有五間陳列室，陳列蔣中正總統各種紀念文物，包括衣冠、勳章、文獻及照片等，從中可以瞭解蔣中正總統生平及中國近代史的演變與發展。蔣中正總統紀念辦公室陳列之文物，係蔣中正總統在總統府辦公使用物品及書籍等，其擺設陳列以原辦公室之面貌忠實呈現，使民眾更瞭解蔣中正總統簡樸的生活。」（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1: 11）新聞報導中的「我國現代史」、展覽年鑑中的「中國近代史」，都點出了90年代至2000年代文物展視室的展示目的除了紀念領袖個人之外，開始突顯領袖與國家的連結。

文物展視室自1980年4月5日開展以來，一直到2010年展示主題與內容基本上並無太大的變動，僅進行微幅的調整（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編著，2012: 70）。這意味著在2010年展示內容仍停留在1980年代政治思維下的策展，以推崇蔣中正在大陸時期的生平事蹟為主。在臺

<sup>11</sup> 〈1975-1991 時代縮影 做歷史的見證 內容摘要〉，堂史室，<http://hallhistorycenter.cksmh.gov.tw/history/1975/intro.html>（瀏覽日期：2019/08/06）。

灣經歷二次政黨輪替重回國民黨政權後，自 2008 年 11 月起，中正紀念堂管理處開始著手規劃展視室的更新（沅禧室內裝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1-1），並委外發包了多項研究案、腳本撰寫與整體更新評估案。自 2010 年 4 月完成的「蔣公文物常設展展示文案」委託研究為肇始（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編著，2012: 70），在時代思維下重新調整展間與展示的主題與敘事，尤其是思考如何調整「臺灣」在蔣中正生命史中的「現身」。

例如 2010 年《蔣公文物常設展展示文案研究案》的結案報告書修訂版，以「導正過去對先總統蔣中正一面倒歌功頌德的文宣屬性」、「內容目標力求中性、平實與人性化之展示」為目的，建議展視室的策展主題與內容重新調整為三大主題、13 個子題，即：1. 革命世代，包含環境巨變、師法改革、革命風潮、蔣中正與孫中山締交等 4 子題；2. 中國興起，包含五色旗下的紛爭、統一與建設、國共競合、敵乎？友乎？廢除不平等條約等 5 子題；3. 臺灣經驗，包含立足臺灣、戒嚴體制、外交奮鬥、建設與認同等 4 子題（邵銘煌主持，2010: 5-6），建議將臺灣作為展示的三大主題之一。另外 2012 年《蔣公文物展示室常設展整體更新計畫展示腳本撰寫》的期末報告書，則認為「蔣中正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發展實具有不可抹滅的影響力。藉由蔣公文物展視室常設展之更新，讓民眾瞭解真實與親民的蔣中正，削弱其神格化、神聖化的面容，並從中瞭解中華民國百年來的發展」，將展示單元主題分為七大項 41 個單元，七大項名稱為：總說、關鍵年代與關鍵事件、親情與生活、繼志承業、建設復興基地、以反共為畢生志業、為維護民族生存而戰、作為國際人的蔣中正（劉維開、林桶法主持，2012: iv-v）。當中「建設復興基地」與部分的「以反共為畢生志業」、「作為國際

人的蔣中正」3 個主題雖發生在臺灣的時空，但主題擬定與敘事手法較似 1980 年代以降的展示，主要將臺灣故事置於中國國族主義的脈絡之下。

而根據 2012 年的展覽年鑑，文物展視室的展示主題斟酌參考委外研究案的建議後，依照不同展間的空間單元進行區分，實際上訂定為「出生與家世」、「求學與革命」、「領導抗戰勝利」、「在臺復職」、「建設臺灣」與「蔣公紀念辦公室」6 個展間（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 12）。這也是首次展示主題或單元名稱出現以臺灣作為命題。6 間展間恰巧對半均分為蔣中正在大陸時期的「出生與家世」、「求學與革命」、「領導抗戰勝利」3 個主題，與在臺灣時期的「在臺復職」、「建設臺灣」與「蔣公紀念辦公室」3 個主題，在紀念展示中呈現大陸與臺灣並重的情形。然 2013 年的展覽年鑑可見展間主題旋即再經調整，分為「家庭」、「革命」、「抗戰」、「內戰」、「臺灣」與「蔣公紀念辦公室」等 6 個展間（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 2），自此展間主題確立而延續至今。

## 中國歷史記憶的移植與空間重構：第一至四展間

蔣中正總統文物展視室的參觀規劃路線，採單線環狀前進方式。通過入口處銅像所在的大門，即進入到展場內部，在此設置有一套中正紀念堂園區的模型。其後依序參觀第一至六展間，最後回到原先的模型處再出大門離開（參見圖 1）。一至五間展場各配以一張大圖說明展間主題，並輔以時間軸點出重要年代事件。而大圖及內部各展示品的主要解說皆採中、日、英三語對照。

展示是一種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的過程。將展品各別自原先的時空脈絡中移除，轉而安置在展場空間之中，並予

以解說，重新訴說一段新的故事。如同 Crew 和 Sims 所認為的，博物館中的蒐藏與展示被由原先日常使用的連續性時空中移除，再以製作精細的方式進行展出與保存，進行意義的轉換 (Crew and Sims, 1991: 159)。因此博物館體現了意識型態，透露出創建者或管理者未言明假設的一套實踐 (Heartney, 2004: 247)。在第一至四展間中，主要展示蔣中正在中國時期的人生階段變化與國家大事，藉由各項文件、物品、圖片的挑選與陳列，重新織構出蔣中正與中華民國的「中國記憶」。

### 一、主題空間配置與歷史事件

第一展間居各展間之首，象徵著蔣中正生命的起點，以「家庭」為主題（參見表 1）。大圖時間軸標示自出生至死亡 (1887-1975)，主要介紹蔣中正在大陸家鄉的家庭背景及與宋美齡的婚禮。由「家庭」出發，進入第二展間「革命」，時間軸為 1906-1928 年，含括早期的求學、參與孫中山革命事業、黃埔建校、東征一直到北伐統一全中國，但西安事變、九一八事件後對日方針、新生活運動亦被錯置於

此展間。英文標題「Ascending to Power」尤其表現出這段期間在蔣中正的生命中是相當重要的權力攀升階段，由一位沒沒無聞的軍校生到成為全國的軍事領袖。再往下一個展間，邁入蔣中正的下一個人生重要階段「抗戰」。大圖時間為 1931-1946 年，始自九一八事件迄國民政府遷都南京。日文及英文標題表現出展示的重點，即作為中國戰時的領導者指導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展示內容主要呈現抗戰勝利之後的遷都、受降、對日處置，以及抗戰期間國內、外贈與的勳章，與蔣中正在國際上的交往。而第四展間「內戰」時間為 1945-1949 年，自抗戰勝利迄政府遷臺短短不過 4 年。日文標題與中文相似，指的是國、共兩黨在戰後重燃對立，但英文標題則點出由中國撤退至臺灣。然展示物品充斥著大量的個人服飾與用品，其餘則大致以外國贈與勳章、當選第一任總統、來臺訪視為主要內容。

撇除這 4 間展間都有出現些許展品時空主題錯置，並或多或少展出個人服飾、用品的情形，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甚少提及「戰役」。展間二至四的主題看似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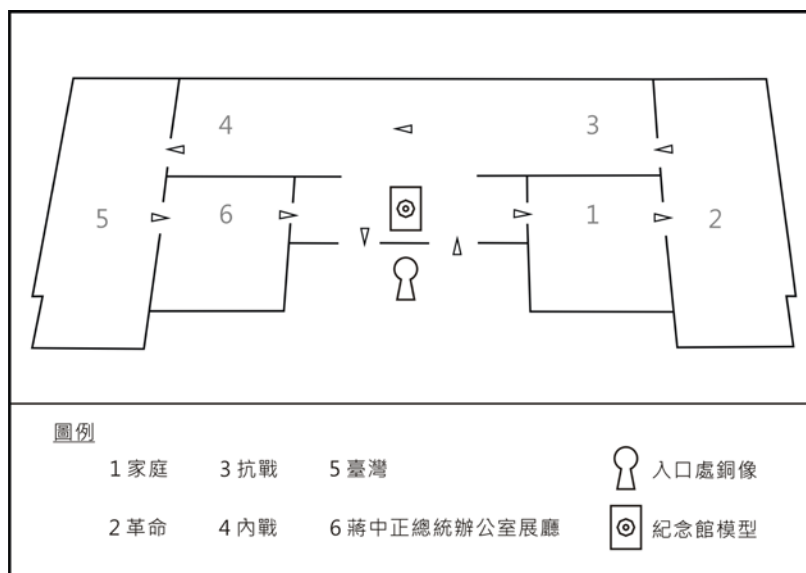


圖 1. 文物展視室展示主題空間配置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表 1. 蔣中正總統文物展視室空間配置表

展間與主題				展示年代對照	
編號	中文	日文	英文	中國／民國年代	西元年
一展間	家庭	家族と結婚	Family Life	光緒 13 年 - 民國 64 年	1887-1975
二展間	革命	革命の實現を志し	Ascending to Power	光緒 32 年 - 民國 17 年	1906-1928
三展間	抗戰	抗日戰爭を指導し 勝利	Wartime Leader of China	民國 20 年 - 民國 35 年	1931-1946
四展間	內戰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 対立が再燃	From Mainland to Taiwan	民國 34 年 - 民國 38 年	1945-1949
五展間	臺灣	臺灣での建設	Presidency in Taiwan	民國 10 年 - 民國 62 年	1921-1973
六展間	蔣中正總統 辦公室展廳		The Gallery of Chiang Kai-shek's Office		

資料來源：參考各主題展間大圖說明

繞著不同類型的對內、對外「戰役」，但實則首要目的在呈現出蔣中正「成功」統一全中國、取得抗戰的「勝利」，以及國內外對其「褒揚」所贈與之勳章。原先應當是展間主軸的各式「戰役」卻被明顯忽略，僅在大圖時間軸標示的年代事件中可能出現。像是「抗戰」展間僅有少數展品點出蘆溝橋事變與長沙會戰的時間，而「內戰」展間更僅有一項展品展示蔣中正飛往延安巡視剿共，其餘展品與國共內戰無太大關聯。當歷史被去脈絡化並重製再現於中正紀念堂這座領袖紀念館時，這些再脈絡化的展品為的是訴說不同時期蔣中正的「榮耀」、推崇其「貢獻」、形塑其「偉大」，而非真實地還原革命、抗戰、內戰過程的艱辛與慘烈。

## 二、中國國族地方感的形構

第一至四展間主要移植了蔣中正在中國的歷史記憶，展品解說牌中時常透過大陸時間（1949 年以前）及大陸空間（省份、城市、地點）來訴說記憶。在 1949 年以前這段時間的展示，1924 年黃埔建校、1927 年與宋美齡婚禮、1928 年北伐統一、1931 年九一八事件、1934 年新生活運動、1936 年西安事變、1943 年當選國民政府主席與開羅會議、1948 年當選行憲後第

一任總統、1949 年下野，尤其是 1945 年的抗戰勝利以及 1946 年還都南京、訪臺與制憲，是最常被指涉、紀念的時間與歷史事件。這 4 間展間或曾提及臺灣時間（1949 年以後）及臺灣空間（多直指臺灣、臺灣省），但比例上屬少數。

易言之，尤其戒嚴威權時期，當高度以領袖象徵國家，以領袖記憶象徵國家記憶，亦即展視室目的所表明的「瞭解蔣中正總統生平及中國近代史的演變與發展」（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1: 11），我們可以看到當中主要交織的是刻意被挑選後的蔣中正個人記憶以及國家記憶。在 1949 年以前抑或說是 1946 年以前，蔣中正與臺灣關聯甚少，然其記憶卻藉由紀念的形式，在臺灣的空間中重現了中國大陸的時空印記，建構出一套以中國大陸為主體的國族地方感。如同 J. A. Agnew 認為的，國家尺度的地方感可以與其他尺度的地方感相並存或為之取代 (Agnew, 2002: 6)。而在這邊我們所看到的是，展品所訴說發生於各個省份、都市、地點的歷史事件，將臺灣人民帶到未曾接觸的時間、土地上所發生的故事，穿梭於浙江奉化、上海、南京、重慶、黃埔、廣州等省份地點之間，從而共同構築出一幅「中國」的經驗地景與國家認同。

### 三、「不在場」的歷史記憶

如果說歷史是一種刪除與挑選的書寫過程，那麼在博物館所展示出的歷史更是如此。Foote 和 Azaryahu 曾經表示，記憶關乎對於歷史的客觀論調，但又時常是一種對於過往人事的選擇性美化與神話，以符合社會或政治目的 (Foote and Azaryahu, 2007: 126)。而我們在中正紀念堂的領袖展視室看到的更是如此。人們所看到的是展間展品展示出的「在場記憶／歷史」，從而忽略了刻意被抹除、遺忘的「不在場記憶／歷史」。許多 1949 年以前蔣中正的生命印記與中華民國歷史未被挑選展示出來，從而讓訪客無形之中「遺失」了某些歷史片段。這些片段中包含了蔣中正領導下的國共戰爭失利、中國大陸淪陷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過程等重要史實，以成就展場所訴說的蔣中正的「勝利」與「榮耀」。

## 臺灣記憶與紀念空間建構：第五、六展間

離開中國的「內戰」展間後，最後的兩間展間展示的是蔣中正人生階段的後半期（參見圖 1）。隨著 1949 年的下野、中華民國政府遷臺與在臺復職，進入了象徵蔣中正在臺記憶的第五展間「臺灣」與第六展間「蔣中正總統辦公室展廳」。

### 一、主題空間配置與歷史事件

「臺灣」展間日文標題為臺灣的建設，而英文標題則為在臺任內（參見表 1）。蔣中正首次踏上臺灣本土始自二戰結束後的 1946 年，時為臺灣光復一週年至臺訪視。但展間大圖時間軸刻意將時間

往前推至 1921 年，形成蔣中正與臺灣早有接觸之錯覺，然該年度蔣中正由香港赴上海僅船隻曾經途經基隆，並未真正踏上臺灣土地。「臺灣」展間以英文標題在臺任內顯得較為貼近展示內容，日文雖名為臺灣的建設，但展示內容以外國政治人物「來華訪問」、蔣中正至各地巡視及出遊娛樂、外國贈與之勳章、雷震案及戒嚴查禁刊物、逝世為主。當中，雷震案及戒嚴查禁刊物對於蔣中正統治下的臺灣社會政治較具批判性，在展視室顯得格外「突兀」，而為數頗多的展品呈現出的國際外交與外國勳章，意圖呈現 1949 年以後蔣中正在國際往來仍十分活躍與充滿榮耀。另外，與第四展間相同，有相當多的展品展示較無相關的蔣中正個人文具、衣著等用品。

最後第六展間為 2003 年 12 月 24 日移設至展視室的總統府辦公室<sup>12</sup>。2014 年中正紀念堂管理處進行場景再造，將原總統府廊道、應接室與辦公室一體呈現，於 2015 年 1 月 20 日重新開放<sup>13</sup>，而成今日第六展廳之面貌。總統府辦公室象徵的是蔣中正在臺統治的合法性，為一統治權力空間的再現。在其逝世後原先位於總統府的辦公室仍被原貌保留起來以為紀念。然進入了民主化的 90 年代，有立委對於此一權力紀念空間提出疑義，經總統府與中正紀念堂協議之後，乃將原先位於總統府三樓的蔣中正生前辦公室文物移交由中正紀念堂接管，依其原貌在展示區中設立專室（中國時報，1994.10.05: 第 7 版；中國時報，1994.10.18: 第 14 版），並增蔣中正蠟像一座，將時鐘指針停在其逝世的夜間 11 時 50 分（中國時報，1994.10.19b: 第 7 版；中國時報，1994.10.19b: 第 7 版），重

<sup>12</sup> 〈1975-1991 時代縮影 做歷史的見證 內容摘要〉，堂史室，<http://hallhistorycenter.cksmh.gov.tw/history/1975/intro.html>（瀏覽日期：2019/08/06）。

<sup>13</sup> 〈蔣中正總統辦公室展廳〉，中正紀念堂管理處，[https://www.cksmh.gov.tw/information2\\_116.html](https://www.cksmh.gov.tw/information2_116.html)（瀏覽日期：2019/08/07）。

現並凝結於當時的權力時空。

## 二、在地記憶中的國族地方感

以臺灣為展間主題出現於 2010 年代，令人相當好奇展示主題到底要呈現出什麼樣的國族地方感？強調什麼樣的國族？與第一至四展間的時空手法略有不同的是，在臺灣展間並沒有以特定的時間連結歷史事件／空間來留下特殊的歷史印記。除了 1975 年的逝世之外，展品中其他 1949 年以後的時間事件性格並不強烈。最常指涉到的臺灣空間，即是「臺灣」本身，亦即直接以臺灣作為記憶發生的故事舞臺。而蔣介石生活所在的臺北、士林、陽明山（草山）算是另一個較常出現的地方。

然在臺灣展間幾乎避而不談中國大陸，僅在展間大圖圖說出現過「反共」字樣，僅一項展品「生活雜誌」解說牌上說明著「本書為 1953 年 3 月 2 日出刊的生活雜誌，內文報導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蔣中正總統的領導下，全國軍民枕戈待旦，隨時可以反攻大陸。」而多數的展品呈現出的外國訪華與勳章贈與，刻意遮掩了中華民國困守臺灣的窘境，但卻又抹除了當時蔣政府大力鼓吹「反共復國」的中國國族主義，使得臺灣展間的國族地方感如同現實狀況般曖昧不明。

自 1949 年來臺後，臺灣成為蔣中正與中華民國的最終歸所。隨著時間的遞嬗，反攻大陸越顯得遙不可及而越發生根於臺灣。最末第六展間總統辦公室展廳是中華民國臺灣最高統治權力空間的再現，複製自臺灣的總統府，而非原先的大陸南京政府，實則在某個層面已然象徵一種座落於臺灣的在地政權與國族地方感。

## 三、「不在場」的歷史記憶

1949 年以後被刻意抹除忽視的臺灣

記憶，首要的即是當時蔣政府大力向臺灣社會灌輸的「反攻大陸」、「反共復國」觀念、白色恐怖，以及 1971 年 10 月 25 日退出聯合國所造成的巨大震撼。如前所述，當鼓吹反攻大陸的歷史記憶由展示中被刻意移除之後，國族主義與國族地方感就更弱化了中國部分，僅剩在地的臺灣。然展示並無建構臺灣國族的意圖，終使得第五展間的國族認同曖昧不明。而退出聯合國事件象徵的是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權力不再被國際認可，此一事件更大力削弱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自稱為中國的立場，亦即弱化其中國的代表性，在展示中刪除退出聯合國事件，有助於鞏固蔣中正仍作為正統中國領導人的形象。

## 定位國族地方感：中華民國的大國外交

一般提到國族地方感的形構，多半訴諸對於國土、特殊地景或地方的認同。而在中正紀念堂的領袖紀念展視室中，除了藉由各省份、都市、地點的故事陳述，建構對昔日故土——中國的國族認同之外，第二至六展間更透過「國際往來」來定位蔣中正在國際上的身份與地位，也定位這是什麼樣的中華民國。「外國」以二戰、國際會議、訪問、勳章贈與等方式，不斷地在展場解說牌中多次現身，甚至在第二、第三、第六展間都（遠）超過臺灣出現的次數。在第五展間「臺灣」雖然以臺灣的空間為主體，但解說牌中出現外國國名的次數卻是高居各展間之首。

據本研究統計，展品中（不含展間大圖）出現的（外國）國家共計 97 次<sup>14</sup>。以國別來看則涵蓋 35 個國家（參見圖 2），廣泛分布於世界各洲，包含 6 個亞太地區國家、4 個西亞國家、3 個非洲國家、1 個

<sup>14</sup> 以解說牌計展品數量，6 間展間共 319 個。

北美國家、9 個歐洲國家、12 個中南美洲國家。因抗戰與二戰的緣故，日本與美國是展示中最常被提及的兩個國家，但兩國出現的形象不大相同。日本一方面在抗戰期間往往以侵略之姿的「敵國」形象出現，烘托最後蔣中正「領導抗戰勝利」。另一方面蔣中正在求學與革命階段又數次旅居日本，是其生命經驗的重要記憶之所。而在二戰結束之後，日本又是蔣中正／中華民國政府重要的外交國家之一。至於與美國往來，往往作為中華民國躍昇為世界強國、蔣中正成為世界大國領袖的佐證。若以二戰期間兩大陣營來看，軸心國的三大國家：德、義、日以及同盟國包含中國的五大國家：美、俄、英、法，皆出現於展品之中；以冷戰時期的三大世界區分，則出現於展品的國家除了有亞、非、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之外，亦包含多

個以美國為首的第一世界國家（西方國家）與數個第二世界國家（共產國家），顯現蔣政權所代表的中華民國與世界強權國家間的交往、互動。藉由與這些國家相關的展品展示與解說，將蔣中正時期的中華民國描繪成一幅世界大國圖像。

然而事實上蔣中正所統治的中華民國歷經 1949 年的政府遷臺，以及 1971 年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更換事件（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尤其後者，嚴重影響了國家的對外關係。根據資料顯示，我國的邦交國數量在 1969 年達到建國以來最高峰，為數 68 個，當時仍勝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44 個邦交國，然退出聯合國事件導致兩國的邦交國數量開始出現黃金交叉，在蔣介石逝世的 1975 年，中華民國邦交國已僅剩 27 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數則攀升至 108 個，顯示世界各國認知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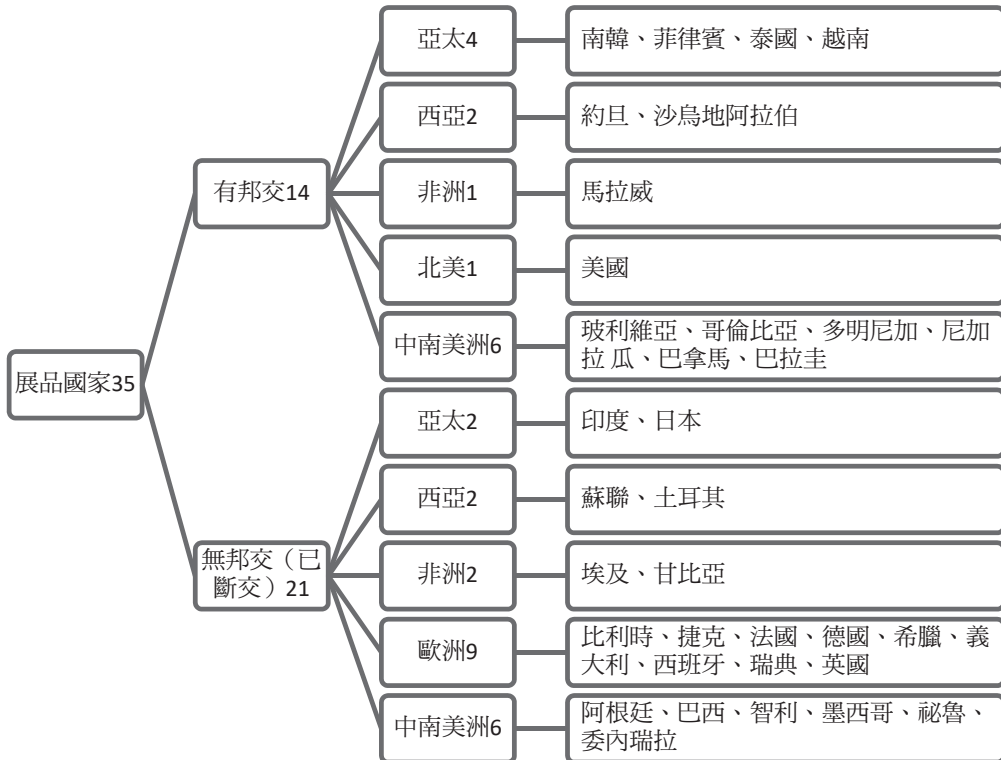


圖 2. 出現於展品的國家洲屬分布及與中華民國邦交情形 (1975.4.3)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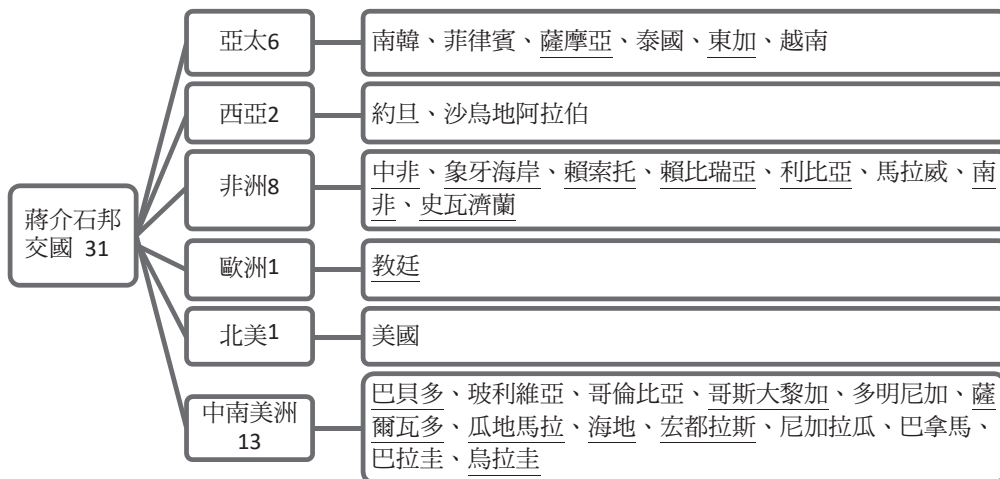
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法律白話文運動，2019: 54、85）。

1975年4月3日蔣中正逝世之時，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數量僅剩31個（參見圖3），包含6個亞太國家、2個西亞國家、8個非洲國家、1個歐洲國家、1個北美洲國家及13個中南美洲國家，歐洲國家僅剩世界面積最小的國家——教廷與我國仍存有邦交關係<sup>15</sup>。而因冷戰格局的影響，位於北美洲的世界霸主——美國勉強與我國仍維持著邦交關係。其餘邦交國多屬於第三世界的弱小國家及前殖民地國家，國家發展普遍較慢，甚至國土面積狹小。以邦交情形進行分析（參見圖2），則35個展品國家僅14個仍存有邦交關係，21個已與中華民國斷交而不存在邦交。這21個國家含括亞太地區的強權國家日本、南亞大國印度、共產強權蘇聯、屬第一世界的西方國家、非洲的文明古國埃及，和幾個中南美洲面積較大的國家。而與蔣政權有邦交，但卻未出現在展品中的國家有17

個（參見圖3），除了唯一一個位於歐洲的邦交國教廷，其餘國家座落於大洋洲、非洲、中南美洲，且許多國家面積相當的小，甚至難以在世界地圖上標示出來。

## 結論

Foote 和 Azaryahuy 在其研究中指出，近來的研究強調公眾記憶地理是一種動態變化的，新的紀念特徵被增加了，然而其他的可能突然或逐漸地消失掉了。紀念館及它們的社會與政治相關性，也隨著不同的時空脈絡而重新被詮釋 (Foote and Azaryahu, 2007: 130)，中正紀念堂領袖紀念館的展示變遷充分的印證了這一段話。蔣中正總統文物展視室最早創設於1980年，展品雖然逐年更換，但多為蔣中正的個人衣物、用品、書籍、圖片等，展示主題與目的曾隨著時代的變化歷經調整變遷。這座領袖紀念館最早為了「永懷領袖」而設立，用以推崇蔣中正的勳業，以



說明：以底線標示的17個國家未出現於展品中。

圖 3. 蔣介石時期邦交國洲屬分布圖 (1975.4.3)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sup>15</sup> 邦交國情形整理自1998年、2000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外交年鑑與〈外交部聲明〉。〈外交部聲明〉，中華民國外交部，[https://www.mofa.gov.tw/News\\_M\\_2.aspx?n=5028B03CED127255&sm=s5ED24855AD8E6C58](https://www.mofa.gov.tw/News_M_2.aspx?n=5028B03CED127255&sm=s5ED24855AD8E6C58) (瀏覽日期：2019/07/22)。

建構領袖崇拜及紀念。而至 1990 及 2000 年代，展示的目的除了介紹蔣中正一生功績之外，亦使訪客從中瞭解我國（中國）近代史，以領袖象徵國家的意味相當明顯。時序進入 2010 年代以後，領袖紀念館的展示才有了重大的調整，以臺灣為展間主題乃首次浮現。

展視室的創設與編列預算進行大幅度更展，皆發生於國民黨政權下。1980 年的開展充分地反映出威權時期黨國思維下的國民黨意志，在展示紀念中極盡可能將蔣中正推崇至民族救星與世界偉人的地位，藉由領袖紀念繼續鞏固國民黨霸權。而接在 2007 年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風波後，於 2008 年因二次政黨輪替新任的馬英九政府，除了將中正紀念堂由已更名的「臺灣民主紀念館」回復舊名之外，更編列大筆預算重構展視室的軟硬體設施。馬英九雖曾經指示「蔣中正總統事蹟宜採功過並陳方式，多元如實呈現」（沅禧室內裝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8），然更展後的內容雖去除了歌功頌德的口吻，但仍側重呈現其生平中的成功與榮耀，儘量避而不談其過失的部分，呼應國民黨傳統對於蔣中正的論述。因此自創設以來的領袖展視室，呈現的是國民黨所建構的記憶之地。

T. Cresswell 認為地方無可避免的與記憶纏繞在一起。雖然記憶時常指的是個人的，但有屬於社會的，社會記憶的建構時常透過諸如紀念館、博物館等生產地方來貯存公共記憶，而國家政府與文化精英時常熱衷於將國家認同感扎根於國族來自何方與前往何處的歷史之中，以創造國族神話 (Cresswell, 2004: 73, 85)。而 Hoelscher 和 Alderman 也表示，記憶討論的是共享的回憶面向，地方關切當中空間如何被生產的社會本質；記憶是空間性的建構，記憶之所因此涵蓋了地理地方、紀念碑與建築、歷史人物、公共展示與紀念、博物

館、街道命名等 (Hoelscher and Alderman, 2004: 348-350)。我們在中正紀念堂所看到的是，中正紀念堂在威權的時空之下，被作為一個儲存記憶之地而興建。原先屬於蔣中正的個人記憶，在展示中經過刻意地挑選與刪除，重新在 6 個展間予以脈絡化，敘說一段榮耀、輝煌的領袖事蹟。展間主題大致順著蔣中正的人生歷程，由「家庭」到「革命」、「抗戰」、「內戰」、「臺灣」，最後到紀念辦公室，結合了蔣中正的中國記憶與臺灣記憶，也象徵著中華民國來自中國大陸，最後歸向臺灣的國族地方感轉向過程。

自第一展間至第四展間，透過時間與空間重塑蔣中正中國記憶的手法是相當明顯的。原先應當充滿慘烈戰役的「革命」、「抗戰」、「內戰」展間，卻幾乎避而不談戰爭情勢，大力鋪陳二戰期間與結束後的「榮耀」與「勝利」，藉由與強權國家間的外交互動，展示中國（中華民國）躍昇為世界大國之林，從而讓人民感念蔣中正的功勳與中國躍昇為世界大國的形象，忘卻其領導內戰失利和國家退守臺灣的窘境。在蔣中正的生命歷程中，「臺灣」一直是一個特殊的命題，而這一點也反映在第五展間的規劃上。第五展間「臺灣」如同前面展間的手法，透過大量的國際「訪華」與外國勳章贈與，讓中華民國維持在二戰結束後的世界大國形象，也讓蔣中正仍然保持著作為一個重要國際領袖的假象。展間刻意隱藏了「反攻大陸」與「退出聯合國事件」等重要集體記憶，讓「臺灣」展間的國族地方感既無法歸向中國，但亦無法牢牢生根臺灣，而如同國家現實般曖昧不明。最後的第六展間總統紀念辦公室係一權力紀念空間，取自臺灣總統府，雖然再現、象徵了蔣中正在臺統治的合法性，但也使得國族地方感的最終歸所——臺灣不言而喻。

在本研究中發現，國族地方感除了

由國家內部進行定義之外，另可藉由對外關係來加以定位。中正紀念堂領袖紀念館所建構出的國族地方感，除了利用歷史事件直接訴諸對於國家空間的記憶與認同之外，更往往透過與國際間的往來，定位中華民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形象，與蔣中正作為大國領袖的地位。為此，展品解說牌中出現許多在蔣中正逝世時已然與我國斷交的世界強權國家或歐洲國家國名，而忽略了一些與我國有邦交的弱小／國土狹小國家。這樣建構出的國族地方感，依存於特殊的時空之中。

借用 Till 的概念來說 (Till, 2001: 273)，中正紀念堂的領袖紀念館即是一個「記憶之地」。這裡所呈現的蔣中正個人記憶抑或是國家記憶不能說是虛假，但卻是經過刻意挑選與刪除的過程所建構出來的。展間展示出的中國記憶，對於中華民國政權及二戰後來臺的軍民而言，是一個重回記憶之地的場所，帶領他們回到大國時期的「勝利」與「光榮」，因為 1949 年以後中國已越發成為遙不可及又極其深刻思念的過往回憶。但對於大部分的臺灣人民而言，自身的歷史記憶在展場中「缺

席」，這段中國記憶是「不在場」的「國家」記憶，僅能透過 Dickinson、Ott 和 Aoki 所說的夢境般的經驗地景來重新體驗與感受 (Dickinson et al., 2006: 29-30)，進行個人記憶的「再中國化」。博物館持有力量塑造集體價值與社會理解力 (Luke, 2002: xiii)，歷經臺灣民主化歷程的中正紀念堂，其展示的紀念文本與記憶文本雖仍呈現出對於蔣中正的領袖崇拜，以及依附於特定時空所塑造出的領袖與國家地位，然展間主題的轉換仍然隱約透露出國族地方感由中國到臺灣，由曖昧到現實的轉變過程。

## 誌謝

本文為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的專題研究計畫之一部分，計畫名稱「領袖紀念中的國族地方感：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國史館的個案研究」(MOST 107-2410-H-259-045-)，在此致謝。另外，感謝中正紀念堂圖書室協助提供館藏史料書籍，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的寶貴意見。

## 參考文獻

- 中央日報，1936.10.17。徐關中正公園並建中正紀念堂，第 1 張第 4 版。
- ，1937.5.2。徐埠中正公園中正紀念堂落成·昨晨舉行落成典禮·胡宗南揭幕·趙光濤報告，第 1 張第 4 版。
- ，1975.7.24。籌建中正紀念堂作初步決定·地點將在陸總舊址範圍內·主要結構包括三個館，第 3 版。
- ，1975.8.22。恭建中正紀念堂及公園·徵求設計藍圖·籌建小組公布辦法，第 3 版。
- ，1980.4.4。永懷 蔣公恩澤·中正紀念堂舉辦文物展·雕塑學會展·蔣公塑像·軍史館展出勳業圖片，第 9 版。
- ，1981.10.12。廳堂聖潔保持完善·來賓留下深刻印象，第 8 版。
- ，1985.10.22。東大新建中正紀念堂·定卅一日啟用·蔣夫人親筆簽名函嘉勉，第 4 版。
- ，1994.10.31。中樞今集會紀念蔣公誕辰·中正紀念堂「蔣公紀念室」今落成揭幕，

第 2 版。

-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編，1985。永恆的懷念。臺北：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 中國時報，1994.10.18。蔣公生前辦公室擺設·移中正紀念堂展覽，第 14 版。
- ，1994.10.19a。蔣公辦公室遷移·多方考量·總統府曾事先溝通·並經中正紀念堂管委會開會核定，第 7 版。
- ，1994.10.19b。總統府蔣公辦公室遷移原貌呈現·中正紀念堂蔣公紀念室 31 日開放，第 7 版。
- ，1994.10.5。中正紀念堂將展示蔣公辦公室，第 7 版。
- ，1997.3.17。中正紀念堂有看頭·下層大廳展出蔣公紀念文物·並設有藝廊、電影室，第 13 版。
- ，1997.6.15。中正紀念堂帶著兒童「繞著歷史玩」，第 15 版。
- 外交部編，1998。中華民國 86 年外交年鑑。臺北：外交部。
- ，2000。中華民國 88 年外交年鑑。臺北：外交部。
- ，2016。中華民國 104 年外交年鑑。臺北：外交部。
- ，2017。中華民國 105 年外交年鑑。臺北：外交部。
- ，2018。中華民國 106 年外交年鑑。臺北：外交部。
- 石曰富總編輯，1991。歷史的光輝。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 李筱峰，2009。兩蔣威權統治時期「愛國歌曲」內容析論，文史臺灣學報，1: 135-178。
- 沅禧室內裝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設展整體更新評估規劃暨紀念辦公室再造施作案·服務建議書（未出版）。
- ，2014。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設展整體更新評估規劃暨紀念辦公室再造施作案·常設展整體更新評估規劃期末報告書（未出版）。
- 周守信，1980。中正紀念堂的施工特色，現代營建，1(4): 22-34。
- 周俊宇，2007。「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蔣中正在臺時期的祝壽現象及其領袖形象塑造，臺灣文獻，58(3): 117-148。
- ，2012。民俗與政治：中國國民黨政權下的清明節再製（1912-2008），臺灣文獻，63(1): 189-228。
- 林正義，2004。臺灣歷史博物館規劃理念與展示架構研究：意識型態變遷與臺灣文化形構探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椰官，1980。中正紀念堂第一期工程施工簡介，土木水利，7(1): 3-9。
- 法律白話文運動，2019。中華民國斷交史。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近代中國編輯委員會，1980。中正紀念堂文物圖錄。臺北：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 邵銘煌主持，2010。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蔣公文物常設展展示文案研究案結案報告書（修訂版，未出版）。
- 俞國華，1980。中正紀念堂之籌建，近代中國，15: 20-24。
- 洪玉菇，2004。戰後臺灣博物館的建立與轉型：以國立歷史博物館展示教化為例（1955-2000）。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胡俊佳，2012。觀光凝視作為文化治理：「兩蔣」、「陸客」與觀光的（去）政治化，思與言，50(3): 97-140。
-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編，2011。中正紀念堂 99 展覽年鑑。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

處。

——，2013。中正紀念堂 101 展覽年鑑。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2014。中正紀念堂 102 展覽年鑑。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編著，2012。中正紀念堂 100 年報。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張歌，1987。聖地行：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卅一日參觀中正紀念堂記感，中正紀念堂，2: 17-20。

陳長華，1976。莊嚴聖潔的中正紀念堂，中央月刊，9(1): 82-84。

黃志堅，2015。從德沃金建構權勢觀點論國家紀念行為：以中正紀念堂與臺灣民主紀念館更名事件的法律爭議為例，通識學報，1: 11-44。

黃倩茹著、廖文碩譯，2011。為後世塑造公眾形象：蔣中正「事略稿本」之編纂，國史研究通訊，1: 166-181。

經濟日報，1975.5.15。永久紀念 蔣公·中常會通過辦法七點，第 1 版。

——，1975.5.16。紀念 蔣公辦法七項·內政部發布實施·分函各機關辦理，第 2 版。

葉韻翠，2013。領袖名與紀念政治：馬來西亞東姑阿杜拉曼之個案研究，中國地理學會會刊，50: 7-59。

——，2014。領袖名與紀念的空間政治：臺灣的中山、中正地名之比較研究，白沙歷史地理學報，15: 47-86。

劉維開、林桶法主持，2012。蔣公文物展示室常設展整體更新計畫展示腳本撰寫期末報告書（未出版）。

蔣雅君、葉琦欣，2015。「中國正統」的建構與解離：故宮博物院之空間表徵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21: 39-68。

駱鵬，1990。中正紀念堂發展之回顧，石曰富總編輯，萬古常新，頁：28-30。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聯合報，1953.1.1。金門前線·軍民迎新年，第 2 版。

薄蘭軍，1989。中正紀念堂文物展視室工作概況，大中至正，6: 59-61。

——，1990。十年來的文物展視，石曰富總編輯，萬古常新，頁：68-70。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簡惠文等編，2014。蔣·故事：閱讀中正紀念堂。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Agnew, J. A., 2002. *Plac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Ital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resswell, T.,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Crew, S. R. and Sims, J. E., 1991. Locating authenticity: Fragments of a dialogue. *In: Karp, I. and Lavine, S. D. (Eds.), 1991,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pp.159-175.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Dickinson, G., Ott, B. L. and Aoki, E., 2006. Spaces of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reverent eye/I at the Plains Indian Museum.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3 (1): 27-47.

Foote, K. E. and Azaryahu, M., 2007. Toward a geography of memory: Geographical dimensions of public memory and commemo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35 (1):

125-144.

- Gruffudd, P., 1999. Nationalism. *In*: Cloke, P., Crang, P. and Goodwin, M. (Eds.), 1999,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pp. 199-206. London: Arnold.
- Heartney, E., 2004. Fracturing the imperial mind. *In*: Carbonell, B. M. (Ed.), 2004, *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 pp. 247-251.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Hoelscher, S. and Alderman, D. H., 2004. Memory and place: Geographies of a critical relationship.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5 (3): 347-355.
- Luke, T. W., 2002. *Museum Politics: Power Plays at the Exhib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ill, K. E., 2001. Reimagining national identity: "Chapters of Life" at the German Historical Museum in Berlin. *In*: Adams, P. C., Hoelscher, S. and Till, K. E. (Eds.), 2001, *Textures of Place*, pp. 273-29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作者簡介

葉韻翠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 Constructing Taiwan's National Sense of Place: Example of the Memorial Exhibition of the National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Yun-Tsui Yeh\*

## Abstract

Due to the recent focus on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related issues, the National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in Taipei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mostly due to its external textu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This memorial opened in 1980. However, the exhibition of this former leader's personal effects has not been well researched.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hrough fieldwork supplemented by document analysis, to focus on the Exhibition Hall of Historical Relics of Chiang Kai-Shek of this memorial hall to examine how Taiwan's national sense of place is constructed and presented and to discuss its meaning.

The purpose of this exhibition hall has changed over time. In the 1980s, "Remembering Our Leader" helped to build a cult of personality around Chiang by praising his accomplishments. In the 1990s and 2000s, Chiang's achievements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ere highlighted, with the apparent attempt to present this leader as the symbol of the nation. In the 2010s, there was once again a major change in the contents of this exhibition, with Taiwan appearing as a subject for the first time. Unde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includes the topics of "Family," "Revolution,"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ivil War," and "Taiwan," as well as the Gallery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Office. This not only serves to integrate the memories of China and Taiwan, but also symbo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national sense of place; that is,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China to Taiwan. A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sense of place, in addition to the use of historic events to stimulate shared memori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national space, this exhibition emphasiz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create the imag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a great power with Chiang as its leader.

Keywords: National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national sense of place, leader, commemoration, museum geograph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and Regional Stud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mail: tea2011@gms.ndhu.edu.tw